

□ 朝鲜·韩国研究

朝鲜政府的五次币制改革及启示

崔 文 李天国

[摘 要] 朝鲜的币制改革一直是世界关注的焦点,系统了解和把握其历次改革的动因与进程以及实施结果十分重要。1946 年,朝鲜设立国立中央银行构建了独立发行主权货币的自主银行体系,并且相继进行了五次币制改革,即 1947 年、1959 年、1979 年、1992 年、2009 年的币制改革,带来了商品价格、价格标准以及社会货币流通量等的较大变化。不过,每次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特点及政策效果是不同的,有时夯实了货币制度基础,提高了中央银行对宏观经济的掌控能力,但有时也引起了货币体系紊乱和过大价格波动,影响了国民经济稳定发展。朝鲜也正在不断总结经验,研究符合国内经济运行的新的货币制度及中央银行改革。

[关键词] 朝鲜;中央银行;币制改革;通货膨胀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22XGJ00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3BGJ054);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自选项目(2022B234)

[文章编号] 1009-3311(2024)01-0029-08

[作者简介] 崔文,延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教授(延吉 133002);李天国,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 100007)。

DOI:10.16154/j.cnki.cn22-1025/c.2024.01.007

2012 年金正恩执政以来,为了改善民生、加快经济增长,朝鲜在经济领域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2013 年,把金正日时代的“先军政治路线”转换为“经济与核武力并进路线”;进行以“朝鲜式经济管理方法”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颁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经济开发区法》,在中朝边境及沿海地区设立 13 个经济开发区等。2016 年,召开朝鲜劳动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实施“2016—2021 年国家经济发展五年战略”。2018 年,再次转换国家发展路线,实施“集中一切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战略路线”。2021 年,召开劳动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实施“2021—2025 年国家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等。

特别在金融领域,从 2014 年开始朝鲜将中央银行的商业银行业务进行剥离,2015 年 7 月修订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央银行法》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①并以中央银行的部分网点为中心进行了商业银行改革。中央银行负责管理国家整体货币流通,并对

^① 朝鲜曾于 2004 年 9 月 29 日以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政令第 686 号颁布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央银行法》,2006 年 1 月 25 日以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政令第 1529 号颁布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

国内所有银行进行金融指导和监督控制;商业银行要灵活运用存款和贷款的利差以及结算业务等措施获得资金来源和收入,并负责机关和企业的资金融通和金融控制,且在经营方面获得了较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基于金融业在朝鲜经济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以及金融业发展在朝鲜经济发展中所担负的重要作用,朝鲜的金融改革一直是世界关注的焦点。本文以朝鲜的相关文献资料为基础,整理和分析了1945年朝鲜解放以后进行的自主银行体系建设及其推行的5次币制改革,归纳了其实施背景、推进措施及政策影响。研究发现,通常遇到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换期朝鲜均进行币制改革和货币兑换,由此带来了物价、价格标准、社会货币流通量等经济指标的较大变化,从而夯实了货币制度基础,提高了中央银行对宏观经济的掌控能力。但是,国内经济基本面以及周边贸易环境较差时,也引起了货币体系紊乱和过大价格波动,影响了国民经济稳定发展。

一、朝鲜自主银行体系的建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从此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宣告终结,朝鲜获得了解放。不过,日本帝国主义滥发的“朝鲜银行券”达到48.4亿元,比1936年底增长了28倍,^①因此朝鲜虽然获得了解放,但恶性通货膨胀在短期内无法得到抑制,一直持续到1947年。在这一背景下,建立发行主权货币的中央银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尤其突出,但是在商品供给没有得到保障的状况下,盲目发行主权货币又极为不现实。朝鲜政府决定,积极鼓励并扩大工业和农业生产,同时引入计划价格,大力发展国营和集体商业合作社,实施配给制,由此逐步稳定了物价。

1946年3月,朝鲜颁布了《北朝鲜土地改革法令》,在“依靠贫农、合作中农、孤立富农、清算地主”的原则下,进行了20多天的“土地改革”并大获成功,没收了100万町步^②的土地,并把其中98万余町步土地分配给72.4万农户。^③此后,1946年4月,朝鲜为了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和农业生产贷款的需要,宣布设立农民银行。^④农民银行成立以后,积极向农民办理贷款,促使农民及时购买小农机械、耕牛、种子等。1947年,农民通过贷款进行了2.2万町步的土地改良工程和2.1万町步的灌溉工程,解决了381.2万公斤肥料、2690头耕牛、2.0万头种猪、7.9万个农用机械,以及91个碾坊、20个仓库、1972所农村俱乐部、1040所成人学校等。^⑤

随着反帝反封建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推进,国民经济中国营和集体经济的领导地位不断得到加强,买办阶级和亲日势力也逐步得到清算,人民开始成为国家主人,由此人民民主主义制度逐渐在朝鲜半岛北部得以确立。这种新面貌和新制度环境要求尽快设立相应的自主银行体系及其中枢机构——中央银行。1946年10月,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第18次会议决定设立北朝鲜中央银行,并且总部设在平壤,在全国各地再设36个支行。^⑥

设立自主独立的中央银行意味着以金融形式掠夺朝鲜人民的旧时代已经结束,人民政府通过中央银行大力加强对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财政指导和监督,并且构建了发行主权货币的自主银行体系。朝鲜的中央银行不仅承担了货币的发行和管理,还要履行政府的资金配置计划,也履行了包括储蓄与信贷这样的商业银行的功能。

① [朝]郑英浩:《朝鲜货币史》第二卷,平壤: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9页。

② 町步是朝鲜的土地计量单位,1町步等于9917.4m²,约等于1公顷。

③ [朝]《现代经济词典》第二卷,平壤:朝鲜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557页。

④ 刚刚得到土地的农民既没有耕牛也没有肥料和种子,亟须农业贷款来解决农业生产要素短缺问题。

⑤ [朝]郑英浩:《朝鲜货币史》第二卷,平壤: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4页。

⑥ [朝]《银行全书》第一卷,平壤:朝鲜工业出版社,1987年,第42页。

具体而言,朝鲜中央银行的功能分为三种:首先是资金供给功能,中央银行按照国家财政计划,向企业、机关和团体提供资金,履行国家财政职能。其次是货币流通功能,货币流通分为现金流通和非现金流通,前者主要用于企业和个人以及个人之间的商品交易,后者适用于企业间商品交易。最后是信贷功能,将吸收的居民存款以信贷形式提供给企业,补充企业生产所需资金。但朝鲜中央银行吸收的存款一直非常有限,因此信贷资金主要来自保险金、汇款以及协同农场账户中的闲散资金。

二、朝鲜政府五次币制改革及意义

(一) 1947年第一次币制改革及意义

1946年8月,朝鲜实施了重要产业国有化政策。实施该政策之后,占产业总产值90%以上的1000余个工厂和企业成为国有企业,这奠定了朝鲜构建自主货币制度的经济基础。^①1947年,朝鲜成功实施一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由此国营和集体商业机构的商品流通总额比1946年增长了9倍以上,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工业完成了80.2%的比重(矿业中占100%),国家掌握了大量粮食和工业品以及农产品,国家财政预算也实现了盈余,有效保障了国家财政的稳定。^②国民经济取得的上述成果,为朝鲜实施币制改革提供了物质条件。

1947年12月5日,朝鲜实施了第一次币制改革,并在1个星期之内圆满结束。新发行的货币面值为100元、10元、5元、1元,且在第二天(12月6日)开始流通。^③1947年币制改革的最大特点是贯彻了阶级原则。虽然新旧货币的兑换比例是1:1,但是最高兑换额度上采取了不同阶级不同比例的原则。

首先,对工人和办公职员及获得国家补助金的居民兑换了相当于上月工资总额的数额,对大学生以及专科生兑换了与一个月国家奖学金相当的数额,对农民则对上交现物税的农户兑换了700元的数额。其次,对雇佣工人、职员人数10人以上的民营企业和民间机构兑换上月工资总额的50%,对雇佣工人、职员人数10人以下的民营企业家、手工业者、小商人及自由职业者兑换一个月企业所得额的50%。再次,对教堂和其他宗教团体则按1947年11月为止的月平均现金支出额的50%范围内给予兑换。此外,对于一般居民则最高兑换额度为户主500元,18岁以上家庭成员为200元。^④

同时,政府将超过货币兑换额度的旧币作为储蓄来吸收。对2000元以下的较低数额吸收其全额;对2000—5000元的旧币只吸收全额的50%;对5000—10000元的旧币只吸收全额的30%;对10000—50000元的旧币只吸收全额的20%;对50000元以上的旧币只吸收全额的10%;对于其余旧币政府则采取回收处理。^⑤

上述阶级原则是基于以下思路决定的:首先,政府向工人、办公职员支付一个月工资,要稳定其生活,而作为同盟阶级的农民,只要上交现物税,就可以兑换相当于工人平均工资的额度。在货币稳定且购买力提高的状况下,工人和农民阶级的实际收入未受影响。其次,手工业者和企业家以及商人是在新社会建设中正在做贡献的一类人,由此目标放在维持正常的企业活动和日常生活方面。最后,对于宗教团体,根据朝鲜劳动党的宗教政策提供了正常运营所需的兑换额度。但是,投机商贩和反革命分子因最高兑换额度限制以及储蓄金额上的吸收限制,其手中的大量货币被收回,而藏匿的货币则变成了废纸。

① [朝]郑英浩:《朝鲜货币史》第二卷,平壤: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49页。

② [朝]《银行全书》第一卷,平壤:朝鲜工业出版社,1987年,第101—102页。

③ 1949年5月,朝鲜又发行了小额面值的50分、20分、15分货币。

④ [朝]《银行全书》第一卷,平壤:朝鲜工业出版社,1987年,第104—105页。

⑤ [朝]郑英浩:《朝鲜货币史》第二卷,平壤: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52页。

通过1947年货币兑换,朝鲜依据阶级原则收回了大量流通领域的旧币,实现了稳定货币的目标,清除了日本殖民时期货币制度的残余,建立了自主的货币制度。从此,朝鲜根据国家的利益独立发行和流通货币,实施了自主的汇率政策。同时,地主、买办资本家等反革命势力的经济实力被削弱,人民生活水平稳定并不断提高。不断增长的商品供给和国家财富给社会提供了充分的物资保障,主权货币有计划地发行和流通,保障了全国各地畅通的商品流和货币流。

(二) 1959年第二次币制改革及意义

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以后,朝鲜利用5个月左右时间进行了战后经济恢复建设,此后实施了三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54—1956年)”。结果,工业和农业等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生产能力超越了战争前的水平,并且科学、文化、艺术及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有效提高。由此,1956年工人、办公职员的平均工资达到了1953年的158%。^①

1957年,朝鲜实施了第一个长期的五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57—1961年)”。“五年计划”的基本目标为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夯实社会主义工业化和自立经济基础,解决人民的衣食住问题。由此,1957年开始朝鲜各地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千里马运动”,^②结果1958年通过国营和集体零售网络流入中央银行的现金收入比1957年增长了125.9%,并且随着商品供给的快速增加自1953年到1958年期间国家制定的零售价格下降了七次,朝鲜货币的购买力大幅提高。^③

经过战后经济恢复建设以及“五年计划”的初期建设,朝鲜完成了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国家财政进一步得到巩固,货币流通体系得到改善,构筑了进行货币兑换的社会、物质、财政条件。此外,自1947年货币改革以后至1959年,经济规模大幅扩大,货币购买力大幅提高,有必要进行价格标准的调整,使货币在流通领域充分发挥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的职能,因此1959年朝鲜进行了第二次币制改革。

1959年2月12日,朝鲜中央银行宣布进行第二次币制改革,具体兑换标准和措施如下:第一,新旧货币的兑换比例为1:100,即新货币1元兑换旧货币100元,价格标准大幅下降。第二,新货币的种类为100元、50元、10元、5元、1元、50分6种纸币,以及10分、5分、1分3种小额铸币。第三,货币兑换以后,工资、商品价格、服务费、债券、债务等重新进行评价和计算。第四,货币兑换没有限额,任何人无差别均按所持有的货币数量全额得到兑换。^④这说明,这次币制改革主要是为了价格标准的变动,不希望任何人产生损失,而增加货币种类是因为在价格标准下降的情况下,考虑了小额货币支付将大幅增加的状况。

货币兑换工作自1959年2月13日至17日在全国各地银行机构和储蓄所、工厂、农场以及在居住地设置的货币兑换所进行。对于进行货币兑换的人,未要求说明其货币所得来源,只要有公民证,就直接给予兑换。因为人人都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者,没必要再设置阶级差别和兑换额度。

1959年第二次币制改革夯实了朝鲜社会主义货币制度,具有以下意义:首先,提高了朝鲜“元”

① [朝]《现代经济词典》第二卷,平壤:朝鲜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788页。

② “千里马运动”是朝鲜人民创造出来的群众运动,它反映了人民要以千里马的气势,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热切愿望。20世纪50年代初期,朝鲜国内面临众多困难,不少人穿不暖,粮食要从国外进口,住房也短缺,因此有些干部认为在朝鲜难以实现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甚至认为实现五年计划是不可能的。在这种形势下,1956年12月朝鲜劳动党召开中央全会,号召全党和全体人民团结一致,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大力开展技术革新和增产节约运动。全会以后,金日成亲自到南浦市降仙钢厂,向工人说明全会精神,号召他们“以跨上千里马的气概向前奔驰”。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解放思想,提出了很多技术革新项目,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增产节约措施。此后,朝鲜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以劳动竞赛、技术革新、教育人民相结合的群众性“千里马运动”。

③ [朝]郑英浩:《朝鲜货币史》第二卷,平壤: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84页。

④ [朝]《银行全书》第一卷,平壤:朝鲜工业出版社,1987年,第145页。

的价值和购买力，并且以相对少的货币流通量保证了国民经济和日益增加的货币需要量，使中央银行准确把握了社会货币流通总量，更有利于计划调节流通中的货币。其次，丰富了货币的面额结构，保障了流通和计算的便利性。随着经济快速增长以及生产效率的提高，在消费品价格普遍下降的情况下，小额铸币的发行加速了商品流通。最后，通过货币兑换和币值的提高，朝鲜“元”的对外地位和信用度得到了提高，朝鲜“元”的价值显著升值。

（三）1979年第三次币制改革及意义

1959年币制改革以后，经过2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朝鲜经济取得了飞跃性发展。通过第一个7年长期“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61—1967年）”，构建了自立现代化工业体系，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通过6年长期“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71—1976年）”，进行了思想、技术、文化的三大技术革命，加强了自立工业体系建设；之后又推出了第二个7年长期“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78—1984年）”，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革命新高潮。

基于上述经济发展背景，1979年朝鲜为了体现新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实现的大变革，实施了第三次币制改革。1979年4月初宣布发行新货币，且于7日至12日进行了新旧货币兑换工作。第三次币制改革中，朝鲜也未设置兑换额度，任何人均可按货币持有量进行兑换。新货币展现了新时期朝鲜社会主义建设业绩，并且在字体和纹样以及颜色上更为精炼。中央银行发行了100元、50元、10元、5元、1元的纸币和50分的铸币并从4月7日起在全国流通，且1959年的10分、5分、1分的铸币可继续使用。^①

1979年第三次币制改革的意义在于，朝鲜推出了反映当时国家发展现状和朝鲜社会主义建设业绩以及先进造币技术的货币。新货币体现了在金日成领导下朝鲜发展成政治上自主、经济上自立、国防上自卫、文化灿烂、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国家新面貌。

（四）1992年第四次币制改革及意义

第二次7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78—1984年）和第三次7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87—1993年）实施以后，朝鲜革命和建设出现了大转换，取得了丰硕的成就。特别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物大量拔地而起，积极推进了国民经济的主体化、现代化、科学化。同时，流通中的货币随着商品生产和流通，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1992年大幅提高了工人、技术人员、办公职员的工资，以及农作物的收购价格。

1992年7月初朝鲜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布政令进行币制改革，自7月15日至20日按1:1比例进行了新旧货币兑换。但是，为了控制货币规模，这次币制改革设置了兑换额度，额度之外剩余的旧币则存到银行。新货币由100元、50元、10元、5元、1元组成，同时之前使用的1元、50分、10分、5分、1分的铸币则继续使用。^②

1992年新货币展现了朝鲜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三大革命旗帜下向前发展的朝鲜光辉形象，并且根据现代科技潮流吸收了先进造币技术且调整了尺寸规格，各个币种较之前变小一些，方便了流通和计算以及出纳业务机械化，为现金流通现代化做出了贡献。

（五）2009年第五次币制改革及意义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东德和西德实现统一以及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以“友好价格”为基础的易货“记账式贸易”也终止，由此朝鲜的对外贸易受到重创。1994—1997年，朝鲜连续四年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朝鲜经济走入困境，出现了粮食危机。2002年7月，朝鲜颁布了《7·1经济改善措施》，把国家财力和资源集中于国防工业和支柱产业，其他经济部门依靠市场机制自力更生，因

① [朝] 郑英浩：《朝鲜货币史》第二卷，平壤：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94页。

② [朝] 《伟大领导人金正日同志的中央银行领导史》，平壤：朝鲜中央银行出版社，1996年，第301页。

此以消费品领域为中心,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物价大幅上涨,居民生活大多通过民间市场来解决。^①

2009年11月30日至12月6日,为了稳定物价、抑制通货膨胀,控制市场体系、强化计划经济,实现货币回笼,消除贫富差距,朝鲜进行了第五次币制改革。这次币制改革中,旧货币与新货币的兑换率为100:1,即100元旧货币兑换1元新货币,而每户人家的最高兑换额度为10万元旧币(1000元新币),之后又进行了两次调整,最后确定每户居民的兑换上限为15万元。^②结果,超过兑换额度的钞票顿时变成一堆废纸,国家强制把不同档次现金持有者的财富基本拉平,立即缩小了贫富差距。

同时,为了确保新货币的使用和增加国家的外汇储备,朝鲜宣布禁止使用外汇,并且在物价体系出现紊乱和物价暴涨的情况下关闭了民间市场,严重扰乱了居民的正常生活。此次币制改革的一大特点是没有预先公告而突然宣布,并严格限定了兑换的时间和额度。不像此前的币制改革事先向居民做出解释和宣传,为其留出消化和准备时间,这次币制改革居民是完全被动、强制接受的。结果,币制改革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其新旧货币兑换比例以及兑换额度也脱离了实际,2010年2月民间市场以及外汇交易重新得到开放,第五次币制改革宣告失败。

需要关注的是第五次币制改革与之前四次币制改革相比,国内外经济环境有较大不同。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发展迅猛,在全球范围内市场经济体制普遍确立,传统和封闭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国内外经济发展趋势。朝鲜严格限定兑换额度和期限,实际上意味着国家将对部分货币进行强制充公。这种充公型货币改革(confiscatory currency reform)通常以遏制恶性通货膨胀、打击地下经济部门非法交易和收回过剩通货等为目标。1987年老挝、1991年苏联、1991年苏丹等国家均曾实行过充公型货币改革。虽然充公型货币改革可以打击一些地下经济部门的非法交易,但容易引起民众恐慌,更可能成为扰乱国民经济系统运行的因素。

三、朝鲜政府五次币制改革的启示

纵观上述五次币制改革,可以发现每遇到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换期朝鲜都进行币制改革,但是其所处的政治、经济背景和特点以及政策效果均具有一定差异。可以说经历了一次货币改革和四次币制改革,即1947年货币改革以及1959年、1979年、1992年、2009年的币制改革,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不同时期的币制改革体现了朝鲜货币当局的不同经济诉求。1947年进行的币制改革本质上是货币改革。一是设定了货币兑换额度,并且按照阶级原则以不同额度的数量给予了兑换,其目的就是收回流通中大量过剩的日本殖民时期发行的旧货币,治理高通货膨胀,结果收回和作废了大量反革命分子手中的货币,坚决打垮了其经济实力。二是用新设立的朝鲜中央银行发行的主权货币替代了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时期发行的旧货币,由此朝鲜开始了拥有自主货币的新时代。三是清除日本殖民时期残留的旧货币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自主货币制度。因此,1947年进行的货币改革,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币制改革,而是旨在建立新货币体系的货币改革。

另外,1959年第二次币制改革和1979年的第三次币制改革实际上只是一种货币兑换。这两次的币制改革中,并未限制货币兑换的规模。其实施目的主要是通过货币兑换应用新制币技术和工艺体现朝鲜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成果。因此,这两次的货币兑换比较顺利,并没有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相

^① 崔文、金华林:《金正恩时代朝鲜的经济改善政策及其评价》,《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第25—26页。

^② 刘洪非、刘晓鑫:《朝鲜货币改革失败的原因及未来政策取向》,《金融发展评论》2010年第11期,第70—71页。

反, 1992 年第四次币制改革和 2009 年第五次币制改革则明显带有宏观调控目标。1992 年币制改革主要政策目标是收回流通中过多的货币量, 而 2009 年币制改革是要克服通货膨胀和削弱民间交易以及缩小贫富差距。

第二, 过于频繁的币制改革不利于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运行。货币应当保持长时间的稳定, 频繁及大规模的币制改革容易带来货币波动和价值体系的混乱, 不利于国民经济系统的稳定和健康持续发展。币制改革只能一次性地调整物价水平, 却无法持久地抑制通货膨胀。没有预期的货币名义价值的变化和通货量的回收政策向居民传递其拥有的货币可能得不到政府的合法兑换的信号, 会影响消费者合理制定消费计划。此外, 币制改革完成以后, 市场很难在短时间内适应新价格, 正常商品生产与交易活动也会在一定时期内受到较大影响。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更多地需要依靠科学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与调控。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社会主义国家“记账式贸易”终止以及 2009 年高通货膨胀等周边贸易环境和国内经济发展基本面不好的时候, 短时间内着手实施币制改革引起了民众对经济运行以及本币的怀疑, 因此币制改革需要经过反复论证后, 谨慎实施。

第三, 币制改革需要遵循市场规律, 维护经济主体的合法产权。充公型币制改革由于限制货币兑换的规模与时间, 经济主体的部分产权将被充公, 而这必然引起市场的恐慌, 扰乱金融秩序。市场经济转型国家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时候, 会遇到过剩货币的处理问题。但在对过剩货币处理过程中, 必须采取遵循市场规律的方式进行改革。在必要的时候, 可以采取商品价格改革、企业产权改革、利率改革等其他领域的改革同时进行, 最大限度地降低币制改革带来的冲击。朝鲜第五次币制改革失败的原因在于, 政府过于急于实现抑制通货膨胀与打击民间交易等目标, 采用过于激进的方式推动了币制改革, 引起了企业和消费者等经济主体的较大不满。

第四, 完善的金融系统是避免激进式币制改革的重要保障。朝鲜历次币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是抑制通货膨胀。这也说明了通货膨胀一直是朝鲜经济发展中的顽疾, 也是长期困扰朝鲜货币当局的问题。由于朝鲜金融体系中, 中央银行作为国家干预和调控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机构, 不仅负责制定并执行国家货币信用政策, 独具货币发行权, 而且还承担着商业银行的吸收储蓄与放贷功能。中央银行背负多种银行职能, 无法像专业的商业银行那样, 顺畅吸收社会闲散资金, 调剂社会各部门的资金短缺, 实现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等方面的调整。朝鲜也在不断总结经验, 探索新一轮金融改革。

2014 年 7 月底, 朝鲜又发行了新版 5 000 元纸币, 并且吸取前期教训并未声张。朝鲜民众对于此次发行新币普遍持赞成态度, 市场也没有出现异常。^① 同时, 朝鲜也悄然进行着金融改革, 2014 年起开始研究分离中央银行的部分业务, 进行商业银行改革试点, 2015 年 12 月时隔 25 年举行了第三次财政银行干部会议。在这次会议中, 金正恩提出了“实现财政银行事业转换, 大力加快强盛国家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阐明了今后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改革的具体方向。^② 不过在国际制裁背景下, 朝鲜的金融改革实施难度还是不小。

^① 郭一娜、陆睿:《朝鲜发行新版五千元纸币民众普遍赞成未有异常》, <https://www.chinanews.com/gj/2014/08-07/6469967.shtml>。

^② 崔文:《朝鲜新一轮金融改革悄然进行》,《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 年 2 月 9 日, 第 3 版。

四、结语

朝鲜是我国“一带一路”建设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中需要加强合作的重要的社会主义国家，由此了解朝鲜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历程是十分重要的。1945年8月朝鲜获得解放并于1948年9月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其后，其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设立社会主义自立经济制度时期（1945—1960年），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且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时期（1961—1986年），经济发展面临多重难关且艰难恢复时期（1987—2011年），金正恩时代经济走出低谷步入正常发展轨道时期（2012年以后）等。^①

特别在金融领域，1946年10月朝鲜设立中央银行，构建了发行主权货币的自主银行体系。此后，1947年12月实施了第一次币制改革，收回大量流通领域的日本殖民时期旧币，稳定了主权货币体系，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奠定了金融基础。此后，由于展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发展成就以及准确把握社会货币流通总量，便利现金流通等原因，于1959年2月、1979年4月、1992年7月先后实施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币制改革，取得了预期成果，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不过，2009年11月在国内出现高通货膨胀、国外周边贸易环境不佳的情况下，仓促推进第五次币制改革，以失败告终。

可以看出，朝鲜在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换期多次进行了币值改革，由此带来了物价、价格标准、社会货币流通量等经济指标的较大变化，从而夯实了货币制度基础，提高了中央银行对宏观经济的掌控能力。但是，国内经济基本面以及周边贸易环境较差时，也引起了货币体系紊乱和过大价格波动，影响了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目前，朝鲜也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探索符合国情、顺应经济运行的金融改革路径。不过在空前严厉的国际制裁背景下，实施难度巨大，我们需要持续关注其新进展。

[责任编辑：张京梅]

^① 张蕴岭、李冬新：《东北亚经济概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第168页。

History ,Theory , Practice: The Triple Logic of Xi Jinping Cultural Thought

Hu Jian(5)

Abstract: Xi Jinping Cultural Thought roots in historical logic of culture development , carries on cultural traditions of the Chinese nation , and inherits and develops China's logic of history and culture. It is the understanding and thinking about the process of ancient and modern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es. Xi Jinping Cultural Thought continues Marxist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 ideology and mutual learning of civilizations with meticulous and complete theoretical logic and connotations of the new era. Established in the practice of culture development , Xi Jinping Cultural Thought is bound to innovate practical theories for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 for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for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Historical logic ,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logic are the trinity and they are united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clarify the historical ,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logic of Xi Jinping Cultural Though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civilization creation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Xi Jinping Cultural Thought; historical logic; theoretical logic; practical logic

Generating Logic , Civilization Presentation and Theoretical Transcendence of a New Model for Human Civilization

Li Tieying , Zhang Haoyong(13)

Abstrac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led the Chinese people creating a new model of human civilization over the past centu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ting logic , the new model of human civilization innovatively inherits and develops Marx's and Engels' views on civilization , creatively carries forward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 rationally absorbs and draws on all fine achievements of human civilization , and continues the century modernization cause of the CPC. In terms of the presentation of civilization , the new model is essentially the socialist Chinese civilization , the overall civilization of "five aspects in one" in its layout , the endogenous civilization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 and the new civilization of pursuing the common values of mankind. In respect of theoretical transcendence , the new model has the significance of "five transcendences" , i.e. surpassing the "Western-centered theory" , "capital-centered theory" , "civilization conflict theory" , "the theory that a powerful country is bound to seek hegemony" and "the final conclusion of history" , reflecting the important contribution of the new model to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Key words: a new model of human civilization;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generating logic; civilization presentation; theoretical transcendence

The Jewish Question and Liberal Democratic Government——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n *A Theologico-Political Treatise* by Spinoza

Wu Yansheng , Ma Lanhua(21)

Abstract: It was Spinoza who first raised the Jewish question. In Spinoza's times , the Netherlands had become a battleground for imperialist powers. Spinoza made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good government , i.e. the liberal democratic government in *A Theologico-Political Treatise*.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explore the logical base of Spinoza's theory construction through the liberal democracy. First of all , Spinoza applied historicism and documents reading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concepts , separated theology from philosophy and religious laws from secular rules , and shattered the inherent superiority of the "permanent voter" of Judaism. Secondly , in *A Theologico-Political Treatise* , Spinoza lashed out at the national foundation of the Jewish 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uman nature and freedom. Finally , Spinoza established liberal democracy on the basis of reconstructing theology and reinterpreting the Jewish nation. As the liberal democracy was established after the collapse , it is difficult to find out its effectiveness in problem-solving. Facing the present Palestinian-Israeli conflict , the academic circle is urgently required to contribute more to the resolution of centuries-old conflict of the Jewish people.

Key words: the Jewish question; Spinoza; *A Theologico-Political Treatise*; democratic government

DPRK's Five Monetary Reforms and the Implication

Cui Wen , Li Tianguo(29)

Abstract: DPRK's Monetary reforms have already attracted the world's attention. It is important to systematically understand the motives , the process and the results of these reforms.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tate-owned central bank , DPRK formed autonomous bank system in 1946 , which can issue sovereign currency independently. In 1947 , 1995 , 1979 , 1992 and the year of 2009 , five monetary reforms were conducted in succession. These reforms caused significant changes in commodity price , price standard , and the amount of social currency in circulation. With different social backgrounds and policy effects , the reforms sometimes consolidated foundation of monetary system and improved the control of the central bank over macro-economy. Sometimes , however they caused the disorder of monetar-

y system and excessive price fluctuations ,and as a result made negative impact on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DPRK has reviewed the experience and carried out researches on the new monetary system and reform of central bank that are suitable for domestic economic operation.

Key words: DPRK; central bank; monetary reform; inflation

Policy-based Legislation: Inspirations of South Korea's Experience on Climate Change Legislation

Hu Wei ,Tang Yinzhi(48)

Abstract: Legislations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can be broadly categorized into models of the comprehensive ,the decentralized and the unilateral legislative. Among them ,the policy-based legislation inherits the feature of the “comprehensive” ,and is guiding and flexible as well. South Korea is a typical example of policy-based legislation ,which is oriented to climate justice ,focuses on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and guides the formation of synergies through institutional setups ,presenting a systematic legislative path of “basic law + supportive law + auxiliary law”. Based on China's energy and resource reserves and the current legislative situation ,it is appropriate to shift from decentralized legislation to policy-oriented legislation ,formulate a special *Climate Change Act* as the basic law ,integrate “parallel” climate governance with participatory justice ,bridge the capacity difference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with corrective justice ,and build a binary mode of subject construction that goes beyond the administrative dominance.and shape China's legislative system for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Key words: legislations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South Korea; policy-based legislation

Topics ,Hotspots and Frontiers of Interpretation Studies in Korea

Wang Baoxia ,Su Bingxin(57)

Abstract: Based on Cite Space and methods of relevant literature measurement ,this paper makes full use of the literature data of the KCI (Korean Journal Data) database in Web of Science ,and sorts out the topics ,hotspots ,and frontier of the interpretation in South Korea through the keyword co-occurrence ,cluster analysis ,strategic coordinates and analysis of keywords with the strongest citation bursts to conduct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and graphical presentation of South Korea's interpretation studies. The time distribution of the literature is from 2002 to 2022. Topics mainly include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interpretation teaching ,interpreter ,tourism interpretation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medical interpretation ,interpretation strategies ,etc. The role of interpreters ,skills ,and texts are the core concerns ,and the research is relatively intensive. Moreover ,the study of public service interpretation has also become deeper. Interpreting strategy is popular currently and is a research hotspot and frontier of interpretation study in South Korea.

Key words: interpretation in South Korea; Cite Space; hotspots; research frontiers; keywords with the strongest citation bursts

Kim Ji-nam's Buk Jeong Nok and the Mukden Boundary Determination

Li Huazi(73)

Abstract: Korean interpreter Kim Ji-nam accompanied General Mukden during the China-Korea boundary investigation in 1712 ,and recorded the whole process in his diary *Buk Jeong Nok* ,which has become the important materials to study the Mukden boundary determination. However ,some records are ambiguous as Kim did not conduct an on-site investigation due to his old age. Thus more literatures are needed to refer to apart from *Buk Jeong Nok* to clarify the source of Tumen River and the real HongdanRiver. The diary also reveals that China focused on the boundary determination upon the Changbai Mountain in order to dispel Korea's doubts while hiding its purpose of making the map (The Emperor's Complete Territory) . This reflects different attitudes of both sides toward the boundary investigation and the real situation of suzerain-vassal exchanges.

Key words: Kim Ji-nam; *Buk Jeong Nok*; Map of Mukden Boundary Determination; Map of Changbai Mountain in Manchu Script; major Hongdan River

The Controversy about Gil Jae's the Integrity and the “Debate on the Orthodoxy of King Sin” in History of Goryeo

Chen Bohan(83)

Abstract: The controversy about Gil Jae's integrity ,which was carried out by Korean historians of Lee Dynasty ,is related to the “debate on the orthodoxy of King Sin” in *History of Goryeo* because of the issue of “Sin Dynasty”. The debate is the clash of two historical ideas ,i.e. those who agreed with the official history records and those who opposed the official narrators. Tracing back to the origin of the debate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debate was the product of the political revolution and a battle of public opinion initiated by the political group with the